

科学与人文的划分,是在工业文明占据统治地位以后才出现的事情。

玉渊杂谭》

何须杞人忧天？

文·句艳华

年终之际,12月21日地球得玩完的流言再次在信与不信,沉重和戏谑之间热传。

末日论不是新事物,每当一个神秘的节点,它就会跳出来“狼来了”。当然了,狼每次都来,可依然挡不住流言每每沉渣泛起。

这些流言的源起多是古文明或者灵师的“预言”。老祖宗当年面对自然和世界不像今天我们这样有自信。一降潮沙,一股寒流,一只野兽,随时可能会让他们失去生命。他们对自然和宇宙普遍形成了一种敬畏和恐惧,瑰丽的神话传说、诡谲的末日预言等自然不难诞生。

各种预言中,传播最广和所谓最具说服力的,当属玛雅历法的“终结”。玛雅文明充满神奇色彩,它为人信任,是因为玛雅人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,却在数学、历法和建筑上取得超越时代的成就。玛雅历法众多,其中有一种以5000多年为一个周期的历法,而在2012年12月21日,第

四个周期正好结束,历法也在此戛然而止。人们就认为,世界将在这一天结束。

玛雅人虽然了不起,但这个说法显然属于后人的臆想,既证据不足,也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。玛雅人后裔中的一位长老近期就一直在为自己的祖先辩护,他说这是后人的误读,玛雅人和玛雅历法从来没有说过毁灭的话,历法的停止怎能等同于生命的终止?

赶趟儿的是,12月12日,“战神”小行星前来“探望”,距离地球达到690万公里的近点。气氛有些亢奋,真有那么点末日来临的意思了。然而天文学家告诉我们:“战神”可不是位新客,稀客,科学家上世纪初就盯上了它。它每四年就“光顾”一次,打打酱油就顺着自己原有的轨道遁遁而去。这次照旧。

这世界大多数人并不会相信末日近在眼前,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不太可爱的话题四处传播,有时候还会带动一些本就不太坚强的人干出些匪

夷所思的举动来。在中国,有人抢购蜡烛,散尽家产,国外不少人还正儿八经贮存粮食,制造“方舟”等。看来这所谓末日,还不能仅仅归因于科学知识的不够普及,文化和社会的因素也不少。

一方面,这体现出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地球和自身命运的思考;对于目前科学尚不能完全解释的宇宙盲区,人们充满了好奇和传播的兴致;拉回到现实中,当前的环境恶化、能源紧张、核威胁、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等,让一些愤世者充满了悲观和不满,寄寓以重生拯救世界,这其中有着浓重的基督教文化色彩。

冷静地说,地球有一天走向末路不是不可能。依照唯物主义理论,既有生,就必有亡,任何物质都无法逃避这个原理。今天的天文学家也在说,太阳的聚变燃料耗尽后会膨胀成一个红巨星,并吞掉地球。但是他们也强调,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在50亿年以后。

这个强调很重要。对于人类来说,百年足以望穿秋水,而宇宙时空的计量单位则巨大无比。恐龙这个不幸的物种灭绝时,是6500万年的事,而之前,它们曾在地球生存繁衍了近2亿年。地球的年龄目前断定是50亿年,这显然还是一个“青壮年”。人类文明目前可考的历史只有区区几千年,说处于儿童时代并不为过。

但是,在前述危机感的驱使下,今天的科学家一直在寻找并监测会对地球产生威胁的小行星。众多目标中,其中一颗最高的概率也是三分之一,且是在8万年之后。即便未来的某一天,地球确实需要面对一个新的“战神”,以如今科学技术进步的形势来看,彼时未必没有化解之策。或许我们能让它改变轨道,或者干脆就“击毙”了它,或者其时我们早已寻到另一片宁静家园?

所以,过早担心地球的灭顶之灾,还真有几分“杞人忧天”的意味。

文·木 锄

影像空间》

文·陈 亮

回到一九四二



如果没有贺岁片,我们会如此关注一九四二。

编剧刘震云有言:“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。悲剧之中,一地喜剧。”懂得大悲,懂得大喜,如此算是参透了人心。贺岁片与《一九四二》,并没有字面上那么风马牛不相及。

周作人曾引清人刘继庄《广阳杂记》里的话,说世人“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,此性天中之《诗》与《乐》也;未有不看小说听书者,此性天中之《书》与《春秋》也”,而戏文小说,则是“转移世界之大枢机”。换句话说,这正是挽救世道人心的利器啊。

刘继庄的话有点深。让我们拿电影作比,说白了:老百姓天生就爱看大片贺岁片,你拦也拦不住。如有人能把《一九四二》这样正儿八经苦大仇深的片子,拍得老百姓都爱跑电影院里看,那才真是有心。

“斜阳古柳忆家室,负鼓盲翁正作场。身是非谁管得,满村听说蔡中郎。”陆游这首诗里,描绘了古代说书艺人的表演现场。那位身兼导演、配乐、旁白、表演的话剧演员,给宋朝的观众们带去了类似于今天大片的各种视听享受。

如今勾栏瓦肆已被电影院取代,人们接受影响的方式其实没有改变。观众朋友们们的历史观念与知识,对历史人物、事件的评判力,多半从影视作品里来,正如古人的许多历史常识从说书艺人那里来的一样。

不久前,《温故一九四二》的图书发布会上,冯小刚的出席让一本图书的发布会平添许多娱乐色彩。如没有大腕冯导出席,新书发布不可能这般热闹。可惜媒体所提问题多半八卦无趣,问冯导为何今天精神不佳,问电影票房为何不敌少年派,甚至采访刘震云时也不问苍生问鬼神:刘老师,你为什么打了几个哈欠?

刘震云只好无奈解释:我过去每天也打哈欠,只是今天的哈欠在发布会上与你偶遇了。

冯小刚、刘震云始终强调,《一九四二》是部“虐心”的电影。虐心了,就说明没白看,这就是古人所谓“转移世界之大枢机”的新解读吧。

不过如果仅仅停留在一部电影里,我们却很难说《一九四二》究竟能带来什么,留下什么。带着未干的泪痕,蒙上3D眼镜再去看看少年派,出来后眼前又是一片新天地。电影《一九四二》迟早会下线,冯小刚迟早会给观众朋友们献上第一部欢喜的片子。

要温故一九四二,我们在进出电影院之后,确实还得看看书。

冯小刚在会上说:电影只是一棵树上的累累果实,不是树的全貌。看完电影,我重读了《温故一九四二》和完整版剧本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电影,是一棵并不完整的树。这种不完整,有导演本人对枯枝败叶的主动砍伐,也有被动的删节。从剧本里,我们可以读到更多情节,更深入地了解一些角色的内心。

例如有一场被拿掉的戏,是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。陈布雷批评白修德自以为是,蒋介石叹息道:他们只知道我们应该干什么,不知道我们干了什么。然后说,他们都没有日本人聪明,日本人看透了中国,才敢如此嚣张。

这样的话,对于角色的解读非常关键,而电影里没有表现出来,是很遗憾的。这也恰好说明与图书相比,影视作品才是“转移世界之大枢机”。

剧本枝繁叶茂,而真正扎根入土的,还是原作。

回到一九四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进出电影院,三小时的时间,最多让我们有温故知新的愿望。《圣经·传道书》里的话很悲观,“已有的事,后必再有,已行的事,后必再行,日光之下,并无新事”。我们看了《一九四二》,希望这些事不要再发生,历史不要陷入循环的怪圈,这就是电影带给我们视听盛宴的同时,让我们有所思考的地方。

我们还要进一步阅读刘震云的原作。《温故一九四二》其实是一部组稿,作者与蝗灾时自言:“主编《百年灾害史》的朋友另有安排,我这篇《温故一九四二》,重点不在蝗虫。”

我们确实可以看看那本《百年灾害史》,其实我们可以编出一部“千年灾害史”。《一九四二》剧本末尾就有长达4页的字幕,列出了自东周以来河南的旱灾。仅仅是河南一地,仅仅是旱灾,4页都未能列举完全。

其实,一些过去我们引以为豪的盛世,如康乾盛世,人们的幸福亦只是破碎的片段。所以当代历史学者张宏杰写出了《饥饿的盛世》。他温故的历史提前了一两百年,而且是乾隆盛世,同样也是用心良苦。

《一九四二》剧本末尾可以看到,仅仅记载河南旱灾中吃人的,就多达二十次。

电影里只放了野狗吃人的画面,就已触目惊心,令委员长颜面扫地,无处逃遁,而原作里则记载了人吃人的情况。刘震云写道:“我觉得这些人不去当土匪,不去合伙谋杀,不去组成三K党,不去成立恐怖组织,实在辜负了他们吃人吃孩子的勇气……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,是没有任何希望的。”

我们要温故的看来远不止一九四二。

人物纪事》

库恩:不读原著,怎知误解深如许

一本书问世之后所引发的讨论与思潮,有时会大大超出作者的预期。库恩所著《科学革命的结构》无疑就是这样一例。今年是此书问世50周年,半个世纪以来,这本书不仅成为从事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目,同时也为社会学、心理学、美学、文学等领域贡献了“范式”、“学术共同体”之类的库恩式术语。科学哲学这冷僻领域能够产生出如此轰动的效应,确实是一个奇迹。

然而对于一本哲学著作而言,越是流行,被误解的可能性也越大。20世纪70年代以来,库恩的思想被其追随者们发展到连他自己也无法辨别的程度。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某些科学社会学家们,主张科学知识不是纯粹自然实在与客观经验的反映,而是由利益、权力等社会因素所建构的,经过宣传、妥协和约定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。据说库恩在1980年代的一次演讲中特别批评了SSK(爱丁堡学派发起的“科学知识社会学”),声称自己的观点跟对方的理解完全是两回事,“我可不是库恩派学者”!

为什么库恩觉得自己被误解了?我们知道库恩理论在描述“哥白尼—伽利略—牛顿”革命时最具说服力。在《科学革命结构》成书之前,库恩写了一本科学史著作:《哥白尼革命》。从这本书里,我们或许能够找到答案。

在记载哥白尼的《天球运行论》诞生以及对外界影响的过程中,库恩确实指出了“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大气候”对于产生新的科学观念的重要性,但是他也并未否认学科传统与基础性知识的

意义。比如,库恩认为哥白尼之所以断定行星问题具有既简单又精确的解,是因为当时哲学与科学思想的大气候里,有一种新柏拉图主义倾向,“正如哥白尼自己认识到的,日心天文学真正的吸引力是审美方面的而不是实用方面。对于天文学家而言,在哥白尼体系和托勒密体系之间最初的选择纯属偏好问题,而偏好问题是最难界定和讨论的。”然而,仅凭美感是不够的,“哥白尼是第一个详细地解释地动的各种天文学后果的人。哥白尼与他的先驱们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数学工作,也正是部分地因为他的数学工作,一场前人未能发动的革命爆发了。”

另外,哥白尼对托勒密的“革命”也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决绝。“哥白尼和托勒密的决裂仅仅只是在地球的位置和运动方面。他的天文学所植根的宇宙论框架,他的物理学以及他所使用的数学方法,都是在古代和中世纪科学家们建立起来的传统之中。”

随着科学发展,陆续有一些人反思库恩理论。不过,也许库恩与他们的分歧并不大,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是相当投契的。理论物理学家戴森在《想象的未来》一书中写道,“库恩的书很快成为经典之作,然而它却误导了一整个世代的学生以及科学史学者,让他们误以为,所有科学革命都是由观念所引发的。”戴森提出,除了库恩所研究的由观念所驱动的“哥白尼—伽利略—牛顿”革命,还有另一种由工具所驱动的科学革命,比如以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为标志的分子生物学的诞生以



及由此而来的一场涉及整个生命科学的革命。

如果对库恩的作品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就会发现,他本人并没有忽视技术在科学革命中的作用。比如哥白尼对托勒密的天文学知识的传承:“哥白尼从《至大论》中得到了许多观测数据和几何方法,以及编制星表的资料。有些问题的处理完全因袭《至大论》。哥白尼甚至比托勒密还接近古希腊的天文学家 and 哲学家”;“天球运行

文·孙颖

文心走笔》

思 亲

祖坟在老家村东三里多地的一个山头上。来到尘世这么多年头,还不曾上过祖坟。传统文化里,女儿是外人。《诗经》里就把嫁女叫做“之子于归”;直到今天,女儿出嫁时,喜联横批还有写作“于归之喜”的。归者,回家之谓也。旧观念里,女儿出嫁了才算真正有了家。这种思想到现在还残存在许多家庭的潜意识中。

这次听得父辈族弟要回老家上坟,我却也禁不住想去!如今都是独生子,如此以往,许多人家不就没人上坟了吗?这个想法得到了爷爷的赞同:“去吧,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,异时移,没那么讲究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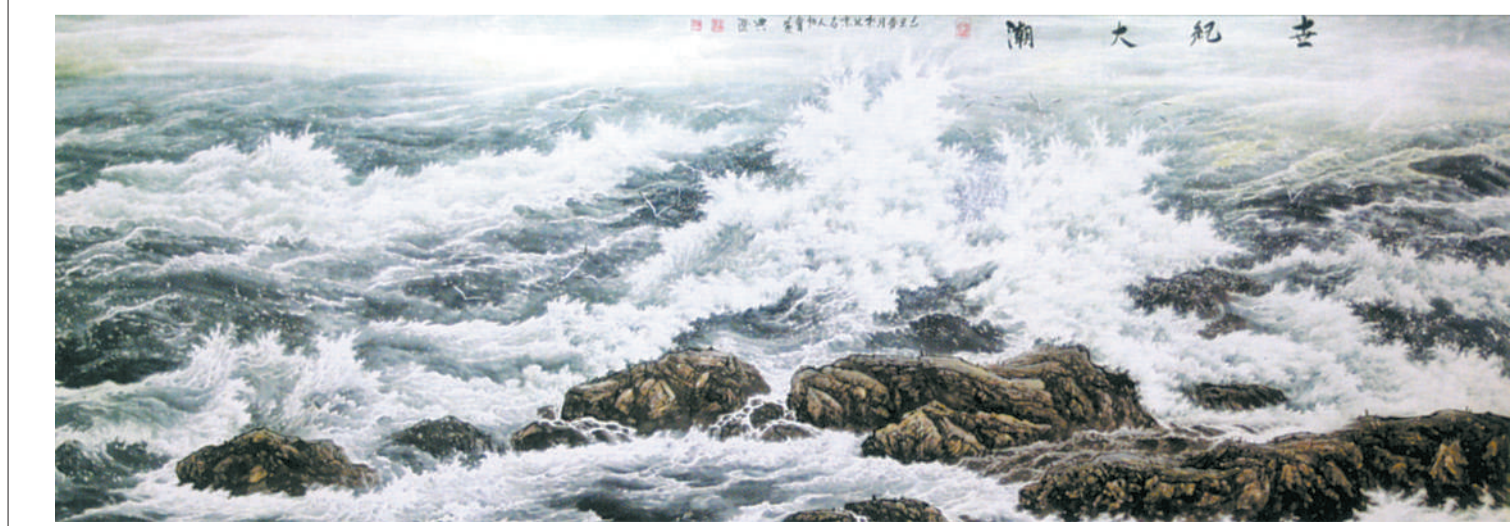
当我站在祖坟前面时,它才由名词变成一个具体的对象。坟地背靠黑石脑,一座高大的石峰,两边是沟,像人的两个胳膊窝。坟地朝南,往左手看,东边的山岭越走越矮,一直到市区西

面。往右手看,正好相反,山岭越来越高,最高的便是市区西山的最高峰——玉皇岭。大雪未消,沟里,洼里,山头,山背,到处都是雪,阳光一照,白花花的。山高多风,细小的雪粒打在脸上,冰冰的,随即又融成纤小的水珠,带着泥土的香味。

我站在一排排祖坟前,听父亲指点:第一排是爷爷的高祖父,我的七世祖;第二排是爷爷的曾祖父;第三排是爷爷的祖父;第四排是老奶奶。看碑文才知道,七世祖是清代道光前后人,距今已近两百年来了。他们离我好远好远,张开想象的翅膀也想不来他们长什么样子。可就在那一刻,山风吹过指尖、脸颊、头发的缝隙,吹进鼻子里,我感觉到一种温柔的抚摸,一种确实的存在,闻到了一种特殊的味道,一种亲人的味道,全身不由得发热。我站在那里,静静地品味着这种味道,真切地意识到,我的身体里流着他们传承下来的血液,潜

藏着他们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基因。我和他们的距离是如此之近,不只感觉得到,甚至摸得到。

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延续的意义:是祖先一代一代赋予了我们生命,所以我们要虔诚地祭祀,追念祖先。幼读《论语》,即知“慎终追远”四个字,可只有此时才有所体悟。人们曾一度有把“孝道”当作封建道德加以批判的倾向,殊不知这是华夏民族的一种生命意识的体现。先民珍惜生命,理所当然要感恩生命的赋予者——父母。古语云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得毁伤。”这种生命观已成为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,是与生俱来的文化心理。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说:自己说了几句不合今上(汉武帝)心意的话而遭受奇耻大辱,辱没了祖先,没有脸面再给母亲上坟祭扫。每当想起这种耻辱,冷汗就从背上渗出,浸湿了衣服……这种感情只有放在华夏民族生命



艺苑

世纪大潮(国画)

李凭甲